



会吃的人去寿县 许春樵

我不知去寿县多少次了。去的时间、地点、任务不一样，体验、感觉、心情也不一样，但每次去有一个主题是一样的：放开胃口，豪吃一顿。十年前秋天的黄昏，出差从阜阳回合肥，一行人异口同声：“下高速，在寿县吃了晚饭再回去！”那年到淮南，朋友上午就提前告知：“晚饭定在寿县聚红盛！”去年同学六安聚会，一位有生活品位的同学极其诚恳地说：“老鹅汤，喝了你才知道什么叫人间美味。寿县也不远。”为老鹅汤，长途奔袭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比较远的寿县，停下车，天已黑透了，路灯全亮了。

2019年，省青年作家研修班定在寿县“聚红盛”，邀请了全国十多位名家、名编来讲课，他们几乎都情不自禁地感叹：“太出乎意料了！”说这话时，他们的手指正指着一桌子的寿县鸡鸭鱼鸭，情绪有些失控。

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地重复，渐渐地就理清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头绪，我第一次去寿县，肯定是奔着楚文化，此后很大程度上是奔着寿县美食去的，虽说这不能作为一个公开的理由，可明摆着的事实是，懂美食的，会吃的人都去了寿县。

去寿县的路上，我的脑海里首先冒出的是鹅三件，鹅头、鹅翅、鹅爪，每次去都要吃的。寿县卤鹅，讲究当天活杀、新鲜入锅、菜品区现场演示，卤水里捞起，迅速剥好装盘，冒着热气上桌，热气被卤水渗透，还没动筷子，已是满屋鲜香，深入肺腑。正宗的皖西大白鹅不喂饲料，不碰添加剂，靠吃草、吃谷子长到两三年后出栏，端上桌的鹅三件，清一色从十几、二十斤的大白鹅身上卸下的翅膀、脑袋、脚爪，堆在白瓷盘里，连骨头带肉，差不多有一斤，迫不及待戴上塑料手套，趁热将鹅从头到脚啃个遍，每个人都啃得专心致志，啃得满嘴流油。味蕾总是贪婪，见桌上还有大盘卤鹅肉堆叠在眼前，不经意间筷子伸过去几个来回，鹅三件还没吃完，胃里已撑爆了。

寿县有好几家餐馆推出了豆腐宴，当年淮南王刘安在寿县无意中发明豆腐的那天，他并没想到两千年后会在这块土地上推出豆腐宴，也没想到豆腐做出了那么多花样。豆腐宴最绝的要数白玉豆腐饺子，豆腐嫩如水，水做的豆腐包成了饺子，且不破不散，密不透风，目瞪口呆中竟不忍心咬上一口；另一道“花开富贵”如出一辙，豆腐改刀切丝，白色豆腐丝散开在鸡汤中，配几片青菜叶，如一朵盛开的白菊花。筷子捏在手里，进退两难，既想吃，又怕一伸筷子碰碎了这完美无瑕的花朵。豆腐宴上有一道豆腐脑现场定型的绝技表演，端上桌的是一个方形木盒里的盛满豆浆，服务员当众将勺子里的卤料倒入木盒中，轻轻搅拌几下，掩上白色纱布，盖上木盖，客人闻到了慢慢溢出的豆腥味，却看不到木盒里的豆浆正在悄悄地改头换面，不到一支烟工夫，打开木盖，掀开纱布，木盒中的豆浆变成了豆腐脑，服务员给每人盛上一碗，配以酱油、辣油、麻油、小葱、香菜，豆腐脑由此而生动、魔幻、美妙、鲜嫩。

一个太阳还没升起的清晨，我陪北京来的一个主编，钻进了一条

四处漏风的巷子里吃早点，早点铺子不约而同地捅开炉火，炸油条、烤烧饼、下面条、熬牛肉汤、炖牛肉砂锅、卖豆腐脑的挤满了一条街。老街上数豆腐脑花样最多，咸豆腐脑、甜豆腐脑、辣豆腐脑、牛肉豆腐脑，一应俱全。我们点了一碗咸豆腐脑，辅以卤鸡蛋和油条，咸豆腐脑装在褐色土碗里，先加上粉丝、豆芽、芫荽、葱、碎椒、麻油，再舀上一大勺酱红色勾芡高汤，味道咸、鲜、辣，口感嫩、细、滑，店家说这是寿县老传统口味，楚幽王那会儿传下来的。传说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豆腐脑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全世界都吃豆腐，豆腐诞生在寿县，寿县算是为全人类的美食进步做出了贡献。也许是基于这一光辉传统，寿县的美食特别讲究，食材原生态，菜肴经典性、厨艺精致化、餐仪式仪式感，将这四个方面融会贯通，融为一体，也只有寿县这么做了。寿县酒楼的鸡、鹅、鱼、鸭都是活杀现宰，牛肉汤要当天新鲜牛骨熬制，展业酒店早餐厅牛肉汤的大锅直接摆在房客面前，锅里牛骨翻滚、牛汤清冽，巨大汤锅边上架了一个烧饼炉子，师傅当场烤制葱油烧饼，新出炉的烧饼，焦香、干脆，咬上一口，再喝上一口刚熬制好的新鲜牛肉汤，那感觉是通体流香、神魂颠倒。聚红盛里有一条50米长廊的菜品展示区，夜幕降临，长廊里人头攒动，灯火辉煌，数百种菜肴动静结合、虚实相间地暴露在食客面前。穿插在展台中间几口巨大的卤锅，现场卤制白鹅、猪蹄、牛肉、鸡爪；一大锅翻滚的豆浆改文火后，浆汤渐渐平静，于是，一层薄膜浮出汤面，慢慢地集结聚合成豆皮，师傅用一根长竹竿一挑，一张湿漉漉的豆皮就晾到了锅旁横木杆上了。食客经长廊进包厢，围桌坐定，见两个古装打扮的店小二一边敲着锣鼓，一边用花轿抬上一大盆红烧土公鸡，在店小二热闹吆喝中，你会感觉到在这里吃的不是菜，而是文化。

文化也是有基因的，有基因就有遗传。寿县对美食的精致追求与精品打造，与地理位置无关，但与地域文化休戚相关，寿县美食无疑是千年古都精致生活品质与精细审美格调的传承与延续。离开寿县后，有一个念头固执而坚定：会吃的去寿县！



风过清流关 姚中华

一条纵贯江淮之间的古驿道，如今还留下一段斑驳沧桑的路基；一座雄立山脊的古关隘，关门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半截高的断壁。在滁州关山清流关，曾经的金戈铁马、浮世繁华早已散尽，只有草木年复一年为沉重的历史换装。深秋，风吹落叶，浅唱低吟。

从滁州市区驱车前往清流关，四十多分钟路程，沿途多为丘陵，路旁高低不平的田野里，庄稼大部分已经收割，只有一些晚熟的稻子依然展示着黄灿灿的稻穗，为秋天留下最后的佐证。穿过一片丘陵，眼前出现一座山，山势不高，但横亘在一片低矮的丘陵之上，便有了鹤立鸡群的气势，那就是关山。按照一千多年前那位欧阳太守的说法，“环滁皆山也”，这或许就是其中的一座。关山原本默默无闻，因为古道雄关，让它一度走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南北争战的焦点。

来到关山，一条残存的古驿道蜿蜒在山坡下，据说长度只有四公里，只是路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完好。路基厚实，路面上砖石虽已破碎，但一块紧挨着一块，镶嵌得依然坚实。一道深深的车辙十分抢眼，如雕刻一般，深陷在光滑的石板上，很难想象曾经承载过多少车马，才会踩踏出如此深的印痕。我不知道如今古道是否还供行人通行，此时一眼望到尽头，见不到一个人影，显得寂寞冷清。倒是道路两旁的草木十分茂密，霜染过后，树叶呈现出浅绿、淡黄、紫红，色彩缤纷。树木多半是碗口粗的杂树，偶尔也能见到几棵古树，苍老的虬枝立在路旁，像是古道在寂寞时光里的一种陪衬。

古道上最显眼的是一座新建牌坊，徽式建筑，青灰色的门头上刻写着“古清流关”几个大字，像是一处标牌，又像是一种指引。古道一端，越过牌坊台阶，突然消失在一片荒芜的杂草之中，丝毫找不到路基的踪迹；另一端，穿过山脚下的村庄，沿着山坡蜿蜒而上，便是通往古清流关了。

我在古驿道上踽踽独行，想象着清流关在时光深处的模样。有关清流关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吴楚之争，吴国军队向北进发，攻打楚国，除了取道水路邗沟，陆路走的便是清流关。而它真正成为一个军事要塞，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史载，公元937年，徐知诰篡得吴国政权，建立南唐，将国都由原来的扬州迁到金陵（今南京）。南唐除了统治着江南大部分地区，还有长江以北的滁州、濠州、泗州等十四个州。为了便于传达军情，传达指令，南唐开凿了位于滁州清流县境内的关山清流关。从此，这里成为由金陵过江往北的便捷通道。南唐政权战时封关防守，平时向行人开放，通商行贾。关隘附近和古驿道沿途陆续建起了庙宇和商贾落脚的店铺，一

度成为繁华之地。

《滁州志》载：“滁州之关山，上下十五里，由南至巅凡八里，有北至巅凡七里，一夫当关之势也。”

关隘，历来是烽火狼烟的聚焦点。自南唐设关以后，这里便战事频频。明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尚为后周大将时就率兵破南唐第二位国君李璟十五万兵马于清流山下，攻陷了滁州城。对此，欧阳修在他的《丰乐亭记》中有详细的描述：“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后来，明朝将领常遇春自清流关出兵，一举消灭了元末另一支武装首领张士诚的精锐；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与明朝将领卢象升各率兵马又在此交战。一次次战役不仅印证了清流关的重要军事地位，也让古关隘声名大振。

江淮之间，两江相隔，一度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对峙和争夺的分水地界，穿越起伏不定的丘陵间主要有三条古驿道，而途径清流关的古驿道是其中最便捷的一条。从地理位置上看，清流关南望长江、北控江淮，是出入的必经之地，因此有“金陵锁钥”之称，长期被战事阴影所笼罩，似乎是它的宿命。

金戈铁马，通商行贾，一切都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是时光缝隙中遗漏的痕迹。呈现在我眼前的清流关，早已不是一座雄视江淮、护卫金陵的古关隘，只是关山山脊上一处狭窄的豁口；一条斑驳的古石板路从豁口中间穿过，两侧是半截高砖石垒砌的墙壁，上方有成堆坍塌的石块，显然是关门倒塌后留下的痕迹。关口两旁的山岭长满了杂草和树木，已无险峻可言。能够见证古关隘历史的，可能就是立于豁口两侧相对应的石碑，可惜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识。

关隘前有几只陈旧的石槽，像是古代战马的饮水槽，成就了我对古关隘烽火连天的想象。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古关隘以它的险峻为枭雄们立下了赫赫战功，只是它拯救不了过往王朝的命运，投射在史册上的也只是雪泥鸿爪般的碎片。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如今古关隘早已被岁月风化，就连关山也许都忘记了它曾经的容颜。

站在关前，忽然想起曾任滁州太守、北宋诗人欧阳修来此留下的诗句，“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此时为深秋，我看不到雪景，秋风吹过，落叶潇潇。